

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基本经验

梁建新¹, 余 荣²

(1.广西大学 法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2.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文化影响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开始呈现出正向加速递增效应。我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生成文化影响力赖以提升的经济硬实力及其健康增长的发展模式;锻造坚定自觉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多元传播方式。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软实力;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3-0093-11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3.010

The Basic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Cul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ANG Jian-xin¹, YU Rong²

(1.School of Law,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influence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judge whether a country has become a cultural power or no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fluence of socialism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gun to demonstrate a positive acceleration effect.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enhancing cultural influence in China mainly manifests in seven aspects: generating hard power of economy on which cultural influence depends and its sound growth development model; forging firm and self-conscious cultural confidence;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irmly grasping the leadership, management and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work; strengthen the value guidance of socialism core values; constructing three systems of soci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ways of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of socialism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influenc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ft power; basic experience

收稿日期:2021-04-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18ZDBM09);长沙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SS94)

作者简介:梁建新(1971—),男,湖南安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君武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党内法规、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余 荣(1995—),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革命文化为底色、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开始呈现出正向加速递增效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看待当代中国价值观念。”^[1]美国南加州大学外交研究中心联合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共同发布了《2018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中国连续四年跻身全球软实力30强,名列27位,中华文化的文化影响力指数位列前十^[2]。此外,在文化“走出去”方针的指引下,以相声、曲艺、戏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飘香海外,巡回演出,场场爆满;以《战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为代表的中国影视作品海外热播,广受好评;而一度“沉默寡言”的中国文学也开始自信地参与世界文学交流,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中国文学正成为世界文学创新的重要生力军。总之,中国的文化元素正深度融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透过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影响力节节提升的现象,深刻总结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基本经验,不难发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客观基础:生成文化影响力赖以提升的经济硬实力及其健康增长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P178)}“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47)}这些论述对于理解我国文化影响力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特定时代的文化与特

定时代的思想、意识、精神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物质关系在观念层面的折射与回声,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必定要以强大的物质关系作为其“自然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文化影响力赖以提升的经济硬实力及其健康增长模式。

中外历史实践表明,文化影响力不可能建立在薄弱的现实基础之上,离开了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支撑来谈文化影响力无异于缘木求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稳中求进,仅仅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4]。2020年,我国在短时期内夺取了抗击COVID-19疫情的胜利,并迅速进行复工复产,经济社会稳定发展,GDP顺利突破100万亿大关,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5](P10)}“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5](P4)}在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科技成就也亮点纷呈,北斗系统的成功,量子卫星的发射,天宫二号的上天,国产航母的下水,让国人扬眉吐气,也使世界刮目相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文化劣根性已经日益失去其生长的土壤。

我国经济等硬实力的增长固然为我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硬基础”,但是,“硬实力”与“影响力”之间并不是一种必然的正相关,如果硬实力的增长方式是靠强取豪夺所获得的,是用血与泪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那么这种硬实力不但不会产生文化影响力,相反还会

弱化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国日益增强的经济硬实力之所以能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本质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要求,彰显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深厚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意涵,因而能够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坚持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P411)}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不等于同步富裕,在改革开放初期必然有一个先富与后富的差别,但是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并朝着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新时代,就更要坚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就是贯彻共同富裕原则的生动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人生之大幸。”^{[7](P158)}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在制度层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经济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个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相继进入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之中,但是究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本性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不相容的,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并不是要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为如果不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加以限制性引导,任由其发展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从而削弱我国的经济软实力。

因此,在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同时,必须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把资本逐利的本性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使其在一个合规的利润空间中运行,趋利避害,引导私人资本服务于国计民生。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是资本家至上,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要求、与共产党人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7](P137)}如果我国经济的发展只是服务于少数特权阶层、少数资本集团,也许经济硬实力也可以做大做强,但是,这种经济硬实力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硬实力,不是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硬实力,因为“消解和否定了人民的观念,就摧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石,摧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基础”^[8]。

四是中国经济发展坚持了绿色发展的基本理念。资本主义时期,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盲目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多重恶果。我国经济的发展决不能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新路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坚持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才有光明的未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7](P366)}。

二、主观心理:锻造坚定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硬实力的增长,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并没有作出完全正能量的反应,一些人在享受着我国

改革与发展成就的同时,却“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对于西方文化几乎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对于西方人天生的傲慢与种族优越感也是理所当然地予以默认,对于西方散布的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主权国家过时论等,丝毫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性分析,而是和着西方的节奏应节而舞。在这种文化洋奴心态支配下,他们以轻蔑的态度否定中国文化与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否定党和国家的领袖与历史英雄人物、否定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文化领域的这种心理生态,既与西方近代以来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领土主权与民族自尊的肆意践踏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所推行的文化转基因工程相连,有些人有意无意就成了西方文化精神摧残战的俘虏与炮灰,沦为世人所不齿的文化汉奸。因此,中国文化要真正融入世界文化版图,中国要崛起成为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就必须重塑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文化自信^[9]。

十八大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提升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0](P26)}这是我党首次提出“文化自信”。2016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第一次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提并论,而且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P32)}文化自信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会更有动力、理论自信才会更有理性、制度自信才会更有保障。

“自信”,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肯定与信任自己的心理状态。一个拥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必然能清醒认识自身的优势,并接受并不完美的自我;也不会因为自我有缺陷而妄自菲薄,绝不盲目崇拜具有某种优势的“他者”,因而不会以“他者”之长来量自己之短;同时,也能与其他主体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绝不会盲目拒斥“他者”,在固步自封中苦心经营夜郎自大的虚幻王国,在自信的表象下掩盖深层的自卑。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高度自觉的文化自信,其文化影响力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文化自信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中国人民对祖国几千年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所具有的发自肺腑的自豪与自尊,对现行的生存样式、制度选择、行为模式与思维范式的充分认同,以及对自己秉持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坚定与执着。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说:“他(指鲁迅)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为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崇拜或轻易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12](P8-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其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具有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文化气质。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

三、文脉传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对此,我们不禁追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它们较之前相比有哪

些发展?这种发展又是如何实现的?将这些问题细致考察,可以得出:我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以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P32)}“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3]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影响力提升的根本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传统的、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宣传者、创新者,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4](P164)}。由此,这一文化“双创”方针成为了新时代我们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7](P18)}。可见,文化“双创”方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

俱进品质的方向保障,进而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法宝。

创造性转化,指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有借鉴价值的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可用毛泽东精辟的四个字加以概括,即“推陈出新”。所谓“推陈”,是指对于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的内容要予以弃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5]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15]。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为提升文化影响力提供正能量。所谓“出新”,即对于经过改造后能成为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予以转化。这部分的文化是党和国家坚持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内容。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就出自《礼记·礼运》,表达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将其用于今天表达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国情,充分表达了人民需求,引起民众共鸣,又能提升文化影响力。

创新性发展,指要在尊重中华传统文化本色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的需要,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提升其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华部分,必须积极加以继承并进行创新性发展,使之不断发扬光大。2018年3月,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围绕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提出四个最新论断——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

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既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底蕴的深刻思考,又怀着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连绵不断文明的崇高敬意。同时,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强调要在秉承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国虽大,好战必亡”等价值追求,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方案^[16]。它超越西方国家标榜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共同体”的狭隘性。在抗击COVID-19疫情期间,这一方案凸显了非凡的价值,在为人类应对COVID-19疫情构筑起真实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大大增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提升了中华文化影响力。

四、根本保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史,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简称“三权”)的更迭史。在阶级社会里,任何试图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阶级,都会竭尽全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3](P164)}这就是说,要推翻旧的统治秩序,新阶级就必须把自己描述成为全体非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并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唯一具有普遍真理性。可以说,没有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无法巩固政权,更何谈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并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

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7](P193)}。可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极其重要,对于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而言更是发挥着根本保障作用。

首先,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居于“三权”的核心地位,统领管理权和话语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指特定领导人员或领导集团所掌握的设立意识形态工作机构、配备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建立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以及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意图的权力。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再次体现出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秉承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立场,炮制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话语和社会思潮,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更是其“重点照顾对象”。如果我们不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就会被西方有毒的理论与思潮感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俘虏。因此,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18];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4]

其次,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是“三权”协同

运行的保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指综合运用计划、组织、指挥、控制与协调等手段,对意识形态资源进行开发整合、对意识形态秩序进行协调控制,以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目的和任务的权力。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办发[2015]52号),充分彰显了党坚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的决心。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7](P33)},强调要“阵地管理不懈怠”,表明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是管理权的重点,也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举措。在现代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舆论阵地管理是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除了加强对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的文艺创作与出版等领域的管理外,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19]

最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是“三权”协同运行的手段。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指话题设置权、舆论主导权、话语表达权等权力形态的统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以核心价值观为聚焦点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交锋与碰撞异常激烈,而“争夺话语权的实质是争夺核心价值观的支配权”^[20]。因此,要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21]。要坚持用世界听得懂、老百姓听得清的话语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的政治话语、学科话语、生活话语,使意识形态话语权与领导权、管理权协调统一及有机衔接,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的提升。

五、价值追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任何一个国家及民族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理想制度设计,提出了“两个必然”的伟大论断。但是社会主义到底要追求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又是什么样的个人?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就缺乏清晰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完全彰显出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正是对这一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些曲折,走了一些弯路。为了回答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P2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全体人民在价值观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义高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价值指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身份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因此,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就成为我国文化影响力提升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经验。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之中,成为全社会应当遵守的价值准则。2016年

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把自由、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用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法治氛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目标和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塑造我们国家、社会、公民形象的精神指南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就是我们的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公民形象的塑造过程。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实际,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国家与社会治理、公民的培养与塑造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1](P33-34)}当前,大街小巷的宣传标语、大中小学的教材内容,基层干部、领导班子的主题学习及各类媒体的舆论发声都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抗击 COVID-19 疫情的人民战争中,不管是居于一线的“最美逆行者”,还是居家隔离的普通民众都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正能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也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比如,2020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都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亮底色,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

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六、科学支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是对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科学认识的结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状况与学科成熟程度往往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产生跨越时空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然而,“资产阶级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22](P252)}以至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标准都是“由西方说了算”,甚至在我国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还存在“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病态心理,无论是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还是话语体系都缺少原创性成果与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23]“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3]因此,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3]。如何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提高中华文化影

响力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保障。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四个问题就专门论述了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并提出了众多寄语和要求。二是要利用三大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传统资源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传统资源是我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发展的深厚土壤。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我国哲学科学发展传统资源的基础上,还要基于宽广的视野广泛吸收人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广泛开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世界级对话与交流,因为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换言之,哲学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人类所必须思考的普遍性问题,这一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尤其凸显。三是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普遍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与尊严。

七、文化传播:实现文化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

文化传播是指不同主体在交往、交流过程中,一种文化从其发源地向其他空间、其他主体进行辐射与散布的活动或过程。传播学派的理论先驱莱奥·弗罗贝纽斯有一个生动形象的命题:文化没有脚。也就是说,文化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对人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影响^[24]。文化的

传播离不开媒介,手势、语言、印刷等都是文化传播的媒介。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媒介正在经历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相对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四大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迎合了当代人们时间碎片化的现实需要,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即时互动与个性化表达,手机短信、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广播等新媒体形态极大地打破了文化交流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同时文化交流的内容更丰富,渠道更广阔,传播也更快捷。因此,探索文化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问题,就必须充分释放新媒体的能量,建设文化传播体系。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新兴媒体对于传播正能量、传递好声音、塑造好形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必将成为文化传播体系建设中的主渠道。

“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理”,这是现实中一种不可理喻的现象,但是,这一现象却蕴含着一条传播学的真理:谁的传播次数多、谁的传播声音大、谁的传播频率高,谁的思想观念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影响就越大。美国有线新闻网凭借强大的新闻搜集与播报能力,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向全世界播报新闻信息,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就是:不管你信不信,“我”都在传播;不管你爱不爱,“我”都在传播。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核心理论就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来构筑国际新闻秩序的,随着CNN坚持不懈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在很多人眼里就成了“普世价值”,美国的利益需求似乎堂而皇之就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因此,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思想内容的科学性与真理性,还取决于其传播能力

与传播体系的现代化水平^[25]。谁的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现代化水平高,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藏在深闺人不知”的文化只能是夜郎自大的自我安慰,根本谈不上对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力。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1](P35)}。可以说,实现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的时代要求。

适应新时代、新媒体的需要,在传播体系与传播能力建设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行业分工、专业管理等体制机制,围绕提升中国特色文化影响力这一目标,要努力实现“三个融合”:首先,媒体融合。多种媒体的融合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传媒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势。美国的传媒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是单一的报刊业务,经过三四十年的全球业务扩张,现已成为涵盖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出版、电讯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视管理系统开发业务等跨媒介、跨国别的国际传媒巨头。而我国的传媒企业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直到 21 世纪初才开始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媒体融合、产业转型的阵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因此,如何搭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大众媒体与个人媒体、政府媒体与民间媒体优势互补的文化传播平台,实现媒体的高度融合,就成了我国建设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产业融合。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讲,每一种产业都是文化产业,都承担着传播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使命,美国在 200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体系包括:一是以价值观为核心,宣扬并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观;二是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体系,主导国际机制和规范的制定和修改,形成国际制度霸权;三是综合

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四是特别强调要以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26]。从美国的做法及其成功经验来看,一切产业都是文化传播产业,一切活动都是文化传播活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活动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与西方资本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西方企业常常发挥产业融合的整体优势,对中国企业进行诋毁、歪曲与抹黑,“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奇谈怪论,导致中国企业多次亏损、并购失败,而中国的传播企业与投资企业、生产企业之间并没有做到整体联动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与澄清,这就反映出产业融合对文化传播具有重大影响。第三,主体融合。文化传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谁来传播?”大多数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文化传播就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事,是传媒企业的事,与己无关,从而导致:一方面在极力传播文化,修筑千里长堤,巩固和提升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在破坏文化,形成许多导致溃堤的“蚁穴”。因此,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问题上,一定要树立起“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你是怎么样中国就是怎么样”的主人翁意识,实现文化传播主体的高度融合。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来看,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十万的中国留学生、分布于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及工程承包的上百万中国产业工人、中国制造产品等,都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传播企业都必须结合新时代的实际,进行体制、机制与制度的整体性协同创新,充分调动各种传播资源、发挥传播主体的积极性。总之,只有实现媒体融合、产业融合、主体融合,最大限度形成文化传播的合力,构建起适应现代文化的传播体系,才能真正提高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能力。

总之,十八大以来,从客观基础到主观心

理,从意识形态到科学支撑,从文化传承到价值引领,从苦练内功到外树形象,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更加丰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9.
- [2] 2018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R].环球时报,2018-07-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0.
- [5]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著.伟大抗疫精神[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8]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64.
- [9] 张可荣,刘奕汝.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36-43.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1]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
- [12] 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M].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
- [13] 王志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9(2):48-49.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 [16] 刘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48-52.
-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
- [19] 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8/04/21/ARTI5W5SqI09KHkP8wMt40j180421.shtml.
- [20] 梁建新.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力系统结构的核心[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9(3):40-48.
- [2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6-05-18.
- [24] 谢建明.文化传播:模式及其过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120-122.
- [25] 杨玉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向度[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10-121.
- [26] 江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十个问题——基于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105-122.